

既要查封煽暴網 更要控告造謠者

新聞評析

方靖之

在「修例風波」期間成立，專門披露警員隱私資料、煽動暴亂，並且散播各種謠言的網頁「香港編年史」，日前被香港多個互聯網服務供應商禁止訪問。「香港編年史」其後卻在Telegram宣布已購買新域名，網民可再次瀏覽。「香港編年史」違法煽暴煽「獨」，已經觸犯了香港國安法，警方完全有權依法查封其網頁，任何互聯網服務供應商、流動電話服務供應商都必須配合。

「香港編年史」更改域名繼續運作，是公然挑戰國安法、挑戰特區政府，對於如此囂張的行徑絕對不能容忍，必須依法重槌出擊，既要查封煽暴網，更要控告造謠者。

「編年史」實是「煽暴史」

「香港編年史」自開始運作以來，公開了眾多警員和建制派的個人資料，更曾恣憑網民襲擊警方車輛。這個網站已經干

犯了很多宗罪，包括目無法紀的「起底」，違反了《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及法庭禁制令；煽動仇恨，違反了《刑事罪行條例》第9條、第10條，引發居民之間的憎恨和引發對政府的憎恨就可能構成犯罪；亦違反了香港國安法第二十九條（五）：「通過各種非法方式引發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對中央人民政府或者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憎恨並可能造成嚴重後果。」簡直是罪行罄竹難書。

「香港編年史」是一個違法煽暴煽「獨」的網站，在「修例風波」以及黑色暴亂中扮演了煽動、編造謠言、策劃暴亂的角色，對於這樣一個網站直到今日才動手處理，可以說是「遲來的正義」。

網上世界絕非法外之地，全世界都有全盤規管、懲治網絡犯罪的法律，就是發表一些踩界的言論亦隨時被「禁言封戶」。就如日薄西山的美國總統特朗普，就因為煽動國會暴亂，先後被Twitter、Facebook、Snapchat永久封鎖其個人賬戶。而社交平台Parler亦因含有煽動暴亂的不當內容，先後被Google、蘋果公司

和亞馬遜公司下架和關閉伺服器。多個國家亦有訂立規管網上犯法言論的法例，例如新加坡當局早前就通過對《防止騷擾法》的修訂，大力打擊「起底」問題，包括引入新罪行和刑罰、擴大網上欺凌受害人的申訴範圍，以及設立防止騷擾仲裁庭以加快處理申訴申請。

比較而言，香港的網絡罪行問題較其他國家及地區都嚴重，在「修例風波」期間，幾乎所有的暴亂都在網上組織、動員、發動，網上更充斥着各種煽暴言論、造謠造假、起底改圖、欺凌恐嚇，「連登討論區」更是其中一個煽暴集中營。可以說，網絡的不設防是導致「黑暴」一發不可收拾的主要原因，正因為當局沒有大力打擊網絡犯罪，沒有依法追究網絡的違法言論，才導致「香港編年史」、「連登討論區」等可以如此囂張的公然煽暴煽「獨」，無視法律和法庭禁制令，繼續公開警員及建制派的隱私資料。如果不重槌打擊網絡罪行，等如對「黑暴」網開一面，讓他們可以繼續藏匿於網上，隨時準備捲土重來。

香港國安法第43條及實施細則第四項指出，警方可要求服務商對發布在電子平台上相當可能構成危害國家安全罪行，或相當可能會導致危害國家安全罪行的發生的電子訊息作出禁制行動。這說明在制定國安法之時，已經充分了解到網絡對於國家安全的威脅，特意授權執法部門可以對有關平台作出禁制，這樣的禁制不但在於查封網頁，更可要求互聯網服務供應商禁止有關網頁的營運，不論是什麼公司，都必須全面配合國安法的執行。

做到「有罪必究、違法必控」

然而，現在「香港編年史」卻囂張的表示更改域名繼續營運網站，警方應該嚴肅跟進，對於違法的互聯網服務供應商更要依法追究，不能陽奉陰違，更應繼續查封其他違法網頁及討論區。

對於煽暴網當然需要見一個封一個，對於造謠煽暴者更需要依法追究。但令人失望的是，警方雖然對於謠言澄清迅速，

但對於不斷造謠煽動者卻未有採取行動，令一些造謠網民、造謠政棍愈加有恃無恐。在法例上，警方不但可以引用《刑事罪行條例》追究煽動憎恨的行動，更可以引用香港國安法第二十九條（五）追究以非法方式造謠者。這些例子早已不勝枚舉，例如民主黨「大話王」梁翹婷，就是各種政治謊言的始作俑者，並煽動多次暴亂，這些網上都有大量證據，足以作出檢控。

這些並非是什麼以言入罪。全世界都有誹謗罪的法例，然則誹謗罪是否以言入罪？以言語煽動仇恨、造謠以達到一己政治目的，這樣的行為當然是犯法，當然是違反了國安法。

國安法授予了香港止暴制亂的法律工具，效果是立竿見影，但要完全發揮國安法的威力，讓香港真正回復平靜，當局就要全面、完整、有力落實國安法，做到有罪必究，違法必控，既要封暴網，更不能放過造謠者，讓犯法者不能逃過法律責任。

資深評論員

英國違《聲明》在先 BNO持有者恐成犧牲品

議事論事

溫滔森

香港國安法於去年6月30日公布實施後，英國便以此為由，宣布由本月31日起，容許英國國民海外護照（BNO）持有人及其近親，免簽證逗留5年，其間可在英國工作及讀書，之後可申請居留身份，定居12個月後便可正式入籍成為英國公民。為此，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日前指出，英國政府單方面改變BNO的處理手法，如果中央對BNO的態度及處理作出任何決定，特區政府自當積極配合。

不諱言的說，中央改變BNO的處理態度和手法，絕對在情在理。根據《聯合聲明》英方備忘錄第一款：「凡根據聯合王國實行的法律，在1997年6月30日由於同香港的關係為英國屬土公民者，從1997年7月1日起，不再是英國屬土公民，但將有資格保留某種適當地位，使其可繼續使用聯合王國政府簽發的護照，而不賦予在聯合王國的居留權。」可見英國現時單方面准許BNO持有人及其近親申請居英權，已是違反《聯合聲明》英方備忘錄第一款的規定。

中央反制 在情在理

與此同時，中方當日在《聯合聲明》中方備忘錄第一款中，承認BNO持有人為中國公民，以及允許他們使用由英國政府簽發的旅行證件去其他國家和地區旅行，乃是源於英方備忘錄第一款所作出的外交承諾。然而，由此可見，英方現時單方面賦予BNO持有人及其近親申請英國居留權的渠道，已是違反《聯合聲明》英方備忘錄第一款，中方自然再沒履行《聯合聲明》中方備忘錄的必要。

在此情況之下，中方絕對有權作出反制措施。畢竟《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的幾個問題的解釋》（《解釋》）第二款中，承認BNO持有人為中國公民，以及允許他們使用BNO去其他國家和地區旅行，

乃是建基於英方遵守《聯合聲明》前提之上。

然而，英方單方面違反《聯合聲明》英方備忘錄第一款，單純從法理上而言，中央絕對可以修訂《解釋》，要求所有持有BNO或符合BNO申請資格的中國籍香港永久居民，必須在某段時限前主動放棄其BNO申請資格，否則可被視作主動放棄中國籍，其香港永久居民亦將自動取消。

但是大部分回歸前出生的港人均有BNO申請資格，當中不少人過期後並無續領，若是規定所有BNO合資申請人在限期前主動申請放棄BNO，對於無意續領BNO的人來說，又會否帶來不便呢？

因此，對於BNO的反制措施，或許可以針對有意續領BNO，以及利用BNO申請移民的人。在BNO護照的有效性方面，中央絕對可以不再承認BNO為有效旅行證件，特區政府亦可以修訂本地法例，規定香港居民或永久居民離港或回港之時，除了出示香港身份證之外，必須同時出示護照。任何持BNO護照者，將不被視為持有效旅行證件離港或回港。

此外，全國人大常委會亦可透過修訂《解釋》或者作出決定，例如規定任何人參加行政長官、立法會、區議會及鄉郊代表選舉，以及出任公務員之前，必須先行主動放棄BNO護照。至於有意循BNO移民計劃申請英籍之人，則可直接視為放棄原有的中國國籍，並將其香港永久居民身份一併取消。

說到這裏有人或許會問：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或作出決定，會否遭到法律挑戰？答案絕對是否定的。根據高等法院在2017年關於「一地兩檢」的司法覆核案例的判詞已經指出：一、人大常委會的決定等同釋法，本港法院無權裁定有關決定不具法律效力；二、人大常委會有權決定某個議題是否符合基本法及「一國兩制」；三、人大常委會可以通過頒布「決定」來行使其監督權；四、人大常委會可以在基本法的框架外制定對香港有法律約束力的規定。

時事評論員

港事港心



劉國勳

過去一年，區議會在攪炒派佔據下不乏鼓吹「港獨」及濫權之舉、亂象叢生，急需遏止。而現時法例並未有要求區議員宣誓，正正是造成當前亂局的因素之一。香港基本本法第104條規定，行政長官、主要官員、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各級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員，在就職時必須依法宣誓擁護基本法及效忠特區；2016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就基本本法第104條釋法，則進一步明確了拒絕宣誓和宣誓不符合要求的情形。不過，特區在落實基本本法第104條方面還存在不足，區議員等就職宣誓安排及後果等問題，都仍有待進一步明確。

攪炒派上任後不顧民生

根據現行法律，必須宣誓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區的六類人士當中，並未包括區議員。現屆區議會在「修例風波」及黑暴的特殊背景下產生，上任以來亂象頻生，已淪為攪炒派政治表演的場地和反中亂港勢力蔓延的溫床。一年多來，攪炒派區議員置民生於不顧，利用區議會的平台散布仇恨言論、攻擊政府官員、繼續炒作謠言，期間亦不乏濫用資源和越權的行為。例如，有區議員在會議中大唱「港獨」歌曲，利用其權力鼓吹及縱容暴力事件；許多區議員懸掛的橫額，都變成攪炒派文宣工具，藉此顛倒是非、煽動仇恨；還有區議員拒絕服務不同政見的市民，在辦事處門外張貼侮辱市民的標語。

在區議會亂象的影響下，社會撕裂不僅無法得到修補，反而進一步惡化。究其原因，其中關鍵正是區議員就任時毋須宣誓，亦不用承擔違反誓言的法律後果，導致攪炒派區議員肆意妄為。

警方國安處早前拘捕50多名涉嫌違反國安法的攪炒派分子中，就包括不少區議員，突顯出當下在區議會撥亂反正、落實區議員宣誓問題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由此，盡快修訂《宣誓及聲明條例》等本地法例以完善宣誓安排，是當務之急，亦是確保「愛國者治港」的應有之義。

修例助扭轉區會歪風

去年公布實施的香港國安法也為擔任公職人員畫下了紅線。根據國安法第6條，香港市民參選或就任公職時，應依法簽署文件確認或者宣誓擁護基本法及效忠特區。區議員的薪津由公帑支付，區議會有權決定地區公共工程和舉辦社區活動的公帑運用，毫無疑問屬於公職人員，在就任時宣誓亦是理所應當。

同時，特首選舉委員會委員肩負選出特首的重任，同樣應被視為公職人員納入宣誓範圍。

此外，政府亦有必要明確，在宣誓就任後違反誓言的法律後果及機制，這將有利於嚴格規範區議員等公職人員行為。就此，全國人大常委會去年11月就香港立法會議員資格問題作出的決定，已提供了堅實的法律基礎，明確了公職人員若違反誓言必須承擔法律責任。

出任公職時宣誓實為天經地義，放眼國際，在大部分主流西方國家，公職人員宣誓效忠憲法和國家制度，也已是通例。

綜上，政府應加快將基本本法104條涉及宣誓問題進行本地立法，確保在任區議員擁護基本法和效忠特區，扭轉區議會歪風。連日來亦有不少市民及團體針對區議員宣誓問題請願，當局需及時回應民間呼聲和訴求，盡早推動完成修例，讓從前一直發揮重要諮詢作用和正能量的區議會，可重新為香港作出積極貢獻。立法會議員

馬道立任內的貢獻和缺失

議論風生



馬恩國

內的貢獻和缺失是：

其一。面對最近引起公眾憤慨的一些案件，例如在檢控官一再警告的情況下，法院仍批准保釋，最終令致嫌疑人潛逃；或同情一個向警察扔汽油彈的年輕暴徒，稱他是「優秀的細路」；或釋放了一個與其他暴徒在同一時間、同一地點，穿着相同的服裝，戴着類似的眼罩和面具的犯罪嫌疑人，等等。面對這些問題，馬道立依然堅決反對司法改革的呼籲。

他於2020年9月23日發表了一份正式的書面聲明，向公眾解釋司法系統的運作，並指出若果訴訟雙方對結果不滿可以上訴，或若果公眾對法官行為不滿可以作出投訴。雖然全篇聲明沒有談論司法改革，很明顯這份聲明的出台是要解釋為什麼不需要司

法改革。

數月後，即2021年1月5日退休時，明智的他有可能意識到這些反映不滿的途徑（上訴和投訴）無法有效解決上述問題。因此他一改立場說：「如果需要進行任何改革，請給我們提供詳細信息，我們將予以考慮。」因為他理性和開放的思維，可能經過考慮後，認為不應直接拒絕或駁回改革建議。他這樣的正面態度將會為進一步的討論及以後的分析開路。接受建議而非剛愎自用，這是終院首席法官應有的態度。

致力維護司法獨立

其二。無論在外國或本地，許多針對中央的評論都聲稱香港法官在不同程度上承受着「不能損害政府利益」的壓力。有些人亦懷疑法官在審判敏感的政治案件中會受這種外在因素影響。更甚的是，部分香港律師甚至在街頭抗議中高喊口號，稱

「法治已死」。由高等法院原訟法官，到高等法院首席法官，並在之後晉升為終審庭首席法官，馬官為官19年亦是最有經驗和資格去評論此事。在1月5日的新聞發布會上，他理直氣壯批評這些說法，認為這些質疑是無中生有，並堅決和絕對地否認中央或香港特區政府曾對法院施加任何壓力。

其三。在香港，普通法中的「三權分立」理論經常成為辯論的核心。有法官在裁決中認為香港擁有「三權分立」，但中央政府認為這是對基本法的錯誤解釋而香港是沒有「三權分立」原則的。

先放下有關「三權分立」的爭論，實際上，許多實行「三權分立」的普通法司法管轄區並不存在絕對的「三權分立」。當一個政黨獲得足夠的選票組成政府時，立法機關和行政機關都由同一個獲勝黨的人擔任，因此，立法機關與行政機關之間亦為利益共同體，雙方並不相互制衡。在西方政權不斷更替的「三權分立」

制度中唯一保持不變的是獨立的司法機構。

就傳媒不斷追問馬道立香港是否仍然存在「三權分立」這問題，馬官直接表示「三權分立」一詞被政治化。他強調，他不會去談論政治問題，只談論法律。而他能肯定的是，香港仍會保持獨立的司法系統。務實的馬官巧妙地不讓自己墮入形式主義爭拗，引導大家關注重點。

對國安法理解不充分

然而，馬道立並非全然正確。就從香港國安法說起。不知是否因為國安法以中文起草，不像香港現行法律般以英文起草，馬道立似乎沒有準確地明白該法的目的和觀點。

全國人大常委會全票通過香港國安法時，很清楚地表明該法律旨在「預防、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行為，而香港國安法第5條亦重申了這三個原則。出於預防

的目的，第42條通過表達措辭，推翻了一般的保釋權，並指出拒絕保釋是通則，准予保釋屬於例外。馬道立在其書面聲明中說：「第42條僅是准予保釋的一項條件」時，忽略了香港國安法的背景、觀點和目標。正確的解釋應該是第42條不僅是「准予保釋的一項條件」，並設立了更高的標準和原則，對原有保釋安排具有凌駕性意義。

在李國能法官時代，香港司法機構傾向強調個人權利及人權保障。而在馬道立時代，馬官認為個人權利應和集體社區權利取得平衡，轉為比較注重集體權益（請參閱他在2017年法律年度開幕式上的演講）。

然而，直到馬官退休的一刻，我們還沒有看到這種平衡在判例上被確立，成為實際適用的法律原則。

總括而言，我相信歷史將會牢記他為法律界所做的寶貴貢獻。

大律師、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主席